

于光远
著

教育思想文选

教育思想文选

于 光 远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大学文科教育的一些意见·····	(118)
大学文科如何办·····	(145)
发展我国的财经教育·····	(147)
希望对学习经济科学更有兴趣·····	(159)
谈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问题·····	(163)
加强高等学校中的经济学教育·····	(168)
* * *	
智力要靠自己来开发·····	(170)
我对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要求·····	(185)
我希望和青年一起进步·····	(189)
我在治学方面的几个座右铭·····	(194)
* * *	
成人教育小论·····	(210)
作为战略重点的教育和干部智力开发·····	(216)
关于县级和县以下干部经济建设知识的学习问题·····	(232)
建议某些省、市试办这样一种“干部智力开发学校”·····	(236)
一月一书一心得——干部学习的一种办法·····	(240)
* * *	
注意培养“低级人才”·····	(244)
普及农村科学基础知识和农村生产经营技术知识，为农村 经济大发展作好人才准备·····	(245)
关于办讲授“农村科学基础知识”、“农村生产经营技术知 识”的“函授大学”的设想·····	(250)
* * *	

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工作·····	(261)
对西双版纳开发学院研究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264)
成立“热心河北河南教育事业者协会”和“两省教育事业 咨询开发公司”的设想·····	(270)
对“西北开发学院研究组”工作的几点意见·····	(274)
对西北六省、区教育事业的几点意见·····	(276)
* * *	
要重视幼儿教育·····	(280)
儿童玩具小论·····	(287)
儿童智力早期开发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大事·····	(289)
身心素质要从“人之初”抓起·····	(291)
谈谈婴幼儿早期教育问题·····	(295)
* * *	
谈谈教育经济学·····	(303)
关于建立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321)
关于建立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330)

自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对教育的注意不下于经济。教育对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极大,而我国教育事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中遭受的损失也极大。历史上的错误,在教育方面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消除,也决不比经济方面更容易些。而人们对教育事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得很不够。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的。见到这种情况不由得自己不耽心、不着急。因此在这十年中,我有意识地多方面接触我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教育方面的问题,形成不少对教育事业的想法,提出这种或那种建议,从事这种或那种试验。为此,我也讲了不少话,写了不少文章。1983年有一次去贵州,我向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和负责贵州省教育工作的徐副省长讲我的教育思想,谈得很投机,我就提出可以把我对教育方面写的东西编一本文集,供贵州省的同志参考。于是在1984年12月印出了一本我的《教育思想文集》。它的篇幅在二十万字左右。在这以后又写了一些东西。武汉大学出版社愿意正式出版这本文集,于是我就做了一些编辑工作。可是拖到1987年底,武汉大学出版社大概不那么敢出版我的书,书稿

还没有送去就传来了一个他们不准备出这本书的消息。我也就把这件事放了下来。最近党中央又抓教育工作，这又使我想起这件事来，从我写的和有文字记录的讲稿中选出一部分编成一本文集，用它来参加大家关心的关于我国教育工作问题的讨论。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支持，现在这本文集即将付梓。在付梓前我写这篇自序，讲一讲我想在这本文集出版之前想讲的一些话。

现在大家对我国的教育工作意见很大。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时候，代表们、委员们的发言中，对我国教育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这么大，追到根子，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对教育工作重视得不够。从党中央的文献中所表述的指导思想来说，不能说没有把教育工作摆到应有的地位。党的十二大上确定的战略很少，只有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么三个方面、五个部门。但是文件归文件，实际归实际，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的方针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贯彻。首先在宣传工作上，就没有对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进行有力的宣传。这可以查一下《新华文摘》。新闻界和教育界都没有有效地进行这个工作。在十二大结束后不久，我就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一次谈话中给参加十二大文件学习的同志提出了思考题：（1）什么叫做战略重点，是不是因为它对我们建设事业很重要，因此把它列为战略重点？（2）教育被列为战略重点之前和之后，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行动应该有什么转变（这次谈话未收入这本文集）？我对这两道思考题也作了回答。对第一道题的回答是：不能说因为教育工作很

重要而被列为战略重点，因为很重要的工作还很多，但列为战略重点的只有上面说的五个。教育被列为战略重点是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对第二道思考题是我们不能以一般地重视教育工作为满足，而要求对它的重视要达到符合战略重点的程度才行。我出这两道思考题时就想到十二大提出的把教育列为战略重点在提示人们的觉悟的宣传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没有解决问题，文件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纸空文的性质。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当然只能用把道理讲得很透彻的办法来解决。这就要求作科学的研究。指导宣传工作的部门和提供传播工具的新闻出版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是必要的。而在行动上就得象对待战略重点那样地对待它，对它作足够的充分的研究，想出真正有效的办法，而且采取有力的措施。从十二大以后这许多年中，不能说我们的行动已经符合了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的要求，因此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有些方面就更加严重了。

就以教育改革而言。1985年在讨论《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草稿时，我发表过这样一种意见：我说这个决定通过之后只能看作是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中央文件，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还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作出第二个、第三个决定。我说这个决定的水平不可能高。我把我们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的工作情况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工作情况作了一番对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科学界提出了多少问题，开了多少次会，讨论了多少个题目，争论了多少个观点，写了多少篇文章；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又提

出了多少问题，开了多少次会，讨论了多少个题目，争论了多少个观点，写过多少篇文章。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作了多少次决定，在农业方面每年就有一个一号文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就是那次正在讨论中的那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过多少方案，进行了多少试验。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又提过多少方案，进行了多少试验，在那时候，我说写出一个文件、作出一个决定，它的水平高低，不决定于起草文件的那些“秀才”的能力，而是靠实践和科学研究成果作基础。所以，现在离搞好教育体制的目标还相当的远，特别是要实现任何改革总得有所突破。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究竟要突破哪些，现在就很不明确。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的改革，如果真正把教育作为战略重点，也应该用改革的精神及时地解决前进中必须不断解决的问题。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有好几个。第一个问题是权力下放的问题。现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管得太细，许多完全不应该由管理全国教育的政府机构来管的事，教委会都抓在手里，不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下放给地方政府。这大大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使得官僚主义毛病很厉害。在不久前中顾委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周林同志就讲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我也了解到不少这种情况。比如有一个地方政府办的职工大学，根据实际需要招收在职干部进行短期训练。当地政府赞成做这件事。这件事既不要国家出钱，也不要国家分配毕业生，可就必须得到国家教委作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决定，学校本身没有这个权，地方政府也没有这个权。据说招收一名学员都要经过国家教委。而且这样的事国家教委要由两个

局长批，地方政府办的职工大学归教委的一个局管，招收在职干部的事又归教委的另一个局管。所以，一个局批准还不行，得两个局都批准才行。我还听到这样的事，一个大学教授（或者副教授）出国，教委规定可以坐飞机，可是学校钱不够，想改乘火车出国，还得国家教委的批准才行。这样的事多极了，随听随忘，我没有做笔记。这两件算是记住了，细节我没有去调查，但大体情况不会记错。国家教委有过分集中的问题，地方教育局也有类似的问题。前几年到下面访问时，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当地驻军和当地企业希望由当地的一个师范办一个三十来人的幼儿园老师培训班，经费由驻军和企业出，毕业出来的学生驻军和企业要，不增加国家任何负担。学校有这个积极性愿意办，当时的专员公署也同意学校这么办。可是这个学校根据教委会的章程，还要请示省教育厅，而省教育厅竟完全不同意。在管理权限方面，这样的体制居然能够长期存在，这不能不使得大家产生强烈的不满。我认为即使国家由于要解决物价平稳问题，需要在一个短时期强调一下中央集权，但是教育管理方面仍是可而且应该强调下放权力，尽可能把权力下放给学校。有些必须由中央和地方国家教育部门管的，国家教育部门当然要管；不应由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管的（中央也要让许多权给地方），应下放给学校的就下放给学校。我认为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国家教委把许许多多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

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需要展开讨论，采取有效步骤势在必行。我认为教育改革可以说基本没有推开，基本上还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老一套。今天在教育方面的改革还谈不上深化的问题，而是要大刀阔斧地有所突破。

没有真正把教育放在战略重点的地位，除了表现在未能及时有力地开展教育改革外，教育经费不足当然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讲的人很多，我也就没有去做什么研究。不过，我认为增加教育经费的呼声还是应该重视的。我们的教育经费的确太少了。在我们的财政工作的实施中，其他工作也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把现有的拨款当做基数，上升了一个百分比就是很重视这一项事业的表现（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水平法”），而不去研究原先的经费水平本来就很不合理。我认为应该研究我们的教育经费应该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才比较合理，不妨做一些调查，以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和满足较富裕的需要为标准研究一下我国究竟需要多少教育经费，并以此为目标在多少年才实现，在调查中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展开讨论。在进行这种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当然需要参考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这样的数据。在这里应该首先从需要出发再去研究可能。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教育经费究竟缺少到什么程度，在以什么为标准的情况下缺少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把可能性、把困难放在前面，那么就连究竟我们需要多少都研究不清楚，我们对教育经费短缺都不能有一个较确切的基本概念，就更难科学地解决这个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具有重大关系的问题了。因为与国外进行对比的资料尽管重要，但毕竟只具有参考意义，所以根据还应该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先讨论出一个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对于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我是讲得最早的人中的一个。这从集子里我在复旦大学作这方面演讲的日期可以看出。但是这些年我的注意力不是在这方面，因为教育经济学问题主要是一个向上提建议的问题，而我认为许多事情应该属于“自主能动性”的活动范围，我特别看重教育思想，所以，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教育思想文选》。教育经费的困难并不妨碍教育思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教育经费短缺，就越应该从提高教育思想方面取得补偿。

我认为目前我国教育思想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聪明学与教育学》一文中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了一些教育部门工作的负责人：你的意见我们国家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学的指导？他回答不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文革”前我是知道的。那时提倡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文革”中批判凯洛夫，这当然是不对的。“文革”后给凯洛夫教育学平了反，这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我们究竟接受什么教育学，这个问题似乎根本没人说。不说不是不接受哪一种教育学的指导，而是盲目地、随随便便地接受根据各式各样的教育学而产生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等。当然，我并不主张搞一个国家的教育学，即在中国的教育工作中，只允许按照某一种教育思想去工作。在采取何种教育学思想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搞成多个的，并且允许按照不同的教育思想从事教育的实践。但是，认真从事教育思想的研究，展开教育思想的讨论，提高教育思想的水平，对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教育思想对于国家教育工作的指导关系很大。在教育事业、教育工作中，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都有一个教育思想的问题。比方说，在我国学校教育中，特别是文科教学中，搞的那一套死记硬背的方法，不重视思想能力、工作能力的培养，对我国造成的危害很大。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于学校接受这种指导思想而造成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并不需要多少教育经费，而只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把坚持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的人提到显赫的工作岗位上来，把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善于运用科学方法而取得的成果作为学习的榜样就可以了。当然，这并不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造就了许多不懂得独立的科学思考的人，他们总是跟着别人走，跟着风走，他们可以跟着“左”倾的教育路线走，也可以不加分析地跟着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走，这就是现在某些毕业生未能提高思想能力的原因。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我们强调的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我们就应该要求在学习中强调一个“活”字，提倡讨论，提倡分析，这就要要求学生（包括中学生）在学习期间做一点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看课外读物，从事一点社会活动，这些都带有学生自我锻炼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部门一定要有好的教育思想，这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才能搞好。一个学校也是这样。我给一个新办的大学题了这样一段词：“要把一所学校办好是不容易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关键是有没有好的教育思想。缺乏好的教育思想，即使是教学力量强、历史久的大学都有办

不好的问题，更不要说象平原大学这样教学力量还很弱、建校只有一年这样的大学了。”在这个题词中，我还提出“从何处取得这种好的教育思想”的问题，并回答说“主要应从现有的各大学办学经验和教训中进行分析批判中来”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探索，大胆进行改革，大胆试验”。

教育思想这个概念的内容很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就包括很丰富的内容。什么是教育？我对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能够传播开来、能够代代相传的优秀的创造物。文化的内容无非是科学发现、技术创造、艺术创作以及技巧和各种各样的知识。而它们只有凭借传播工具才能传播开来，才能相传万代。传播可以依靠文字。用文字传播的工具就有各式各样的出版物、报纸、刊物、书籍，它们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等，就是依靠文字的传播方式。传播还可以依靠图形或者声音，各种或者带艺术性或者不带艺术性的图画、摄影展览、幻灯、录象、电影、电视、广播、录音、戏剧、音乐、舞蹈，以及展出实物的博物馆等等，就是依靠图形和声音的传播方式。教育也是一种传播工具。这一点似乎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是教育这种传播方式有它的特点。对于这个特点在这本文集中我没有论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弄清楚的问题。说明教育作为传播工具传播方式的特点这个工作，我准备以后去做。现在我想到的有相对固定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定形的教育机构——在近代就是学校这样的教学组织，进行系统的教学活动。这种活动包括面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直接信息交往，是以教育者传授给受教育者知识为主的一种信息传递、各种辅助教学活动的工具、教学

大纲、教材、教具的使用……。这些问题我未来得及研究，只是写到这里顺便提到。

因为教育这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有文集中《教育认识现象学中的“三体”问题》这样的问题。

教育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更带有向下一代传递文化的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条分做三段的平行线”的理论。这两条平行线的第一段是自然界生物演化与人的胚体生长的平行线。这就是人的胚胎生长大体上沿着生物演化的次序，从单细胞发展到人。但是生物经过多少亿年的进化，在人的胚体中只经历十个月，在人的胚体生长发育中具体而微地、高度压缩地重复生物进化的过程。这两条平行线的这一段是德国生物学家《脑创造史》的作者赫克尔发现的。这两条平行线的第二段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同人的个体从儿童到成人发展的历史，即人的个体在婴儿时期其蒙昧程度与最初的野蛮人相仿，以后的发展相当于从蒙昧野蛮到文明，人类在他的个体的发展中也是具体而微地、高度压缩地重复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这两条平行线是另两条平行线的延长。对平行线这一段的规律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有所论述。我认为这两条平行线还可以延长，那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和人类当前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之间的平行线。这就是今天的发现、发明、创造预示着未来社会的发展。两条平行线的这一段，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

我有一个想法，人类社会进步之所以可能就是根据下面这条平行线的，下面这条平行线是上面这条平行线是具体而微的道理把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创造，通过教材研究和教材，通

过先进的学校制度，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为当代青年所接受，以便在这个基础上从事新的创造。我的设想是要使二十五岁左右这一代把前人的创造基本上掌握住（在其具体而微、压缩的形态下），然后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从事创造，为人类的未来开拓道路。这个思想我就写在《教材、学校制度和社会进步》一文中。

这些可以视作我的教育思想的思想。

我不同意把教育视作上层建筑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我认为教育既是一种认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既要从认识的角度来研究教育，也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后者即研究教育在哪些方面和怎样受到整个社会的制约，和研究教育的社会功用。

因为我主要不是从自己理论的兴趣去研究教育，而是从教育在对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从我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来关心教育问题。在我的活动中，与其说着重于教育理论工作，不如说着重教育的实践。我不担任教育工作，我在教育学院和教育机构中除了在一些大学中当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和自己还带着几个博士生外，没有教育工作的岗位。因此我的实践活动主要是支持别人的教育工作，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提到我，要我做某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时候，我或者给他们出一点主张，或者给他们作一点提示，或者给他们做一点具体工作。这样的事比较多，有些也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当我发现那里教育工作存在困难的时候，就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呼吁，出一点主意。我特别对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比较热心，做了比较多的工作。我对有些高等教育的“锅底